

 中国学者文丛

王琴 著

每一种女性职业的发生发展都和具体的时代背景、城市环境密切相关。

本书所考察的几类女性职业。

也对应着城市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

教育文化的发展以及都市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城市工业的进步。

NUXING ZHIYE YU JINDAI CHENGSHI SHEHUI

女性职业 与 近代城市社会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学者文丛

女性职业与 近代城市社会

王琴 著

NUXING ZHIYE YU JINDAI CHENGSHI SHEHUI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王琴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8

(中国学者文丛)

ISBN 978-7-5087-3301-2

I. ①女… II. ①王… III. ①女性—职业选择—研究—中国—近代②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92②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3011 号

书 名: 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

著 者: 王 琴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302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51713

传真: (010) 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导 言 女性职业与城市社会	/ 1
第一章 性别与权力：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	/ 9
一、他者的世界：公共空间的男性化	/ 9
二、性别与权力：家庭中的男女地位	/ 11
三、传统社会的女性职业	/ 12
第二章 新女性：近代城市的女性角色	/ 16
一、近代女性话语	/ 16
二、男女社交公开	/ 17
三、谁是新女性	/ 19
四、职业女性：从家庭到社会	/ 22
第三章 城市转型：女性职业与社会发展	/ 28
一、现代城市建设	/ 28
二、社会风气渐开	/ 30
三、帝都女性	/ 34
四、妇女听戏	/ 38
五、女性职业发展	/ 42
第四章 女职员：新女性还是花瓶	/ 47
一、女子参政的时代背景	/ 47
二、女子参政运动	/ 49
三、政府机关的女性色彩	/ 55

四、“花瓶”女职员	58
五、职场困境	60
六、“妇女回家”	66
第五章 女警：美丽与风化	69
一、近代女警的出现	69
二、中国的女警察	71
三、招考女警	74
四、女警生活	76
第六章 女教师：艰难职场	80
一、近代女子教育	80
二、女校与女学生	91
三、女教师的艰难职场	98
第七章 女店员：商业浪潮	104
一、新式商业女店员	104
二、女子银行	105
三、百货公司	107
第八章 女招待：色情与消费主义	110
一、女招待概况	111
二、女招待的社会角色	116
三、政府的管制和培训	121
四、男女职业的冲突	124
五、取缔女招待风波	129
第九章 舞女：玩物还是明星	135
一、都市跳舞场	135
二、舞女的明星化	137
三、禁舞风波	139

第十章 女工：工业半边天	145
一、女工队伍	145
二、工业的发展	147
三、手工工场：贫民救济所	150
四、花边业	152
五、女工生活	154
第十一章 女性职业与婚嫁	159
一、教育成为嫁妆	159
二、嫁与不嫁之间	163
三、独身主义	168
四、太太生活	170
结 语	173
后 记	177
参考文献	179

导言 女性职业与城市社会

女性职业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注脚，同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职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也有密切关系。了解女性职业的近代发展，也可以由此一窥近代城市的社会状况。

在传统城市社会中，女性所拥有的社会空间和男性有着很大的差异。男性的社会空间是相对公共的，而女性的社会空间则属于私密的状态。传统社会的性别格局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被限制在家庭领域中，而男人则完全占据了社会公共领域。即使在家庭这样的内化环境中，男人一样拥有绝对的家长权威。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都是由家庭赋予的，而且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女人的一生，仅仅扮演着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的角色，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社会身份。女性与家庭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也让女人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阻碍。

而近代女性职业的发展使得女性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女人通过职业的途径，从以前的家庭角色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获得一定的社会身份，也拥有了更多的对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的权力。她们在自己本来的家庭身份之外拥有了新的社会角色，也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伴随女性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城市的社会空间中，社会中男女关系和男女交往出现了新的格局，传统城市社会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女人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参加社会交际，可以和男人一样拥有社会职业，甚至有了自己的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城市格局因为有了这样的角色介入而逐渐脱离了旧有的发展轨迹，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被调整，近代城市在这样的过程中整合进了很多新的社会因素，也加速了城市的现代转型进程。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变化的缩影。近代社会变革的风起云涌和各个主要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很多沿海城市较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社

会风气和城市生活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在近代中国，这些城市是最早接受一些西化的新生活和新观念的地方。而大部分的内陆城市，因袭了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中，它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社会环境较为传统，保留了较多传统中国城市的社会特征。但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下，无远弗届的现代风潮还是渐渐吞没了每一个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需要面临新时代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城市自身发展需求的驱动下，中国的城市也开始了艰难的近代转型之路。

女性职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开放程度以及现代性转型的程度也是密切联系的。因为女性职业作为新时代城市的新生事物，将更多的女性推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和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完全不同的。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城市社会的公共领域，改变城市社会空间的性别结构时，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心理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调适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近代女性职业的发展考量着每一个城市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社会转型，也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过程使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其发展的路径也往往经历了更多的曲折。近代城市发展较为明显地体现着新与旧之间，变与不变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各种对立、融合的复杂纠葛。而这些纠葛的历史情境，在近代女性职业发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透过民国年间女性职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近代城市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权结构的转变，教育文化的发展，都市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城市工业的缓慢起步。城市社会不同领域内的社会转变都有着女性职业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对女性职业的研究为我们考察近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进一步，女性职业也展现了近代城市社会中性别关系的变化。从“男女有别”到“男女社交公开”，从“男主外，女主内”到男女都可以自由出入社会公共空间，这些的转变使得男性和女性都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的调适过程。而通过分析职业女性在近代的家庭生活和职场处境，我们也能更多地了解城市性别格局的变化对社会中男女人群的影响。

关于城市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作出了重要的成绩。

在城市研究方面，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①的开创之功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施坚雅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

① [美] 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

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罗威廉关于汉口的作品《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①也是近代城市史和社会研究的经典,着力探讨了近代汉口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变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近年来“上海研究”^②的热潮中也涌现出许多城市研究的优秀作品。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③是城市研究中富有创新色彩的著作。虽然这本书更多地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阐述上海的新都市文化,但书中重绘“上海文化地图”的努力还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物质空间意义上的都市文化场景。李欧梵描绘了上海的咖啡馆、跳舞场、电影院等具体的城市空间,也探究了书刊和报纸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空间。上海的城市现代性正是在这样的空间建构和生产中被凸现出来。但是,《上海摩登》中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描述还较为粗略,李欧梵所绘制的文化地图也并不完整。

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④中致力于呈现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是城市史研究中难得的“眼光向下”的作品。在上海这个最“现代化”的城市中,市民的日常生活依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在这一视角上,传统与现代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也最生动地诠释了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作者仔细考察了上海的棚户区、弄堂、石库门等小市民的生活,分析他(她)们如何从“乡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城市的普通市民面对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剧烈转型,也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都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卢汉超的努力无疑为城市研究开辟了一片新领域。

① [美]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美]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上海的城市发展,烙印着很深的“西化”痕迹。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最早,也最鲜明的。甚至与很多内地城市相比,在发展上有着很明显的“时差”。但是上海的城市发展也太过特殊,很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上海是中国的“外国”,也是内地城市的“他者”。

③ [美]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美] 卢汉超:《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予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此外，关于北京^①的城市研究，也有很多学者作出了重要的成绩。

迈尔·杰弗里（Myer Jeffery F）在《天安门之龙：作为神圣之都的北京》^②中，分析了北京的传统城市格局，也研究了这种格局所展示的政治象征意义。戴维·斯崔德（David Strand）的《北京人力车：二十年代的民众与政治》^③考察了北京20世纪20年代的人力车夫的生存状态，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普通民众逐渐萌发的市民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④研究了20世纪前30年北京的街道铺设、排污管道、供水照明交通等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⑤，讨论从辽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期历史时段里北京的户籍制度、人口规模、人口增长过程与人口控制等。杨念群在一系列关于民国北京医疗卫生体制的研究中^⑥，将近代城市空间转换的问题和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紧密结合了起来，认为西方卫生实验区的引进使得城市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总体而言，上述城市研究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城市社会的发展状况，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都对本书有较大影响。但这些研究基本还是对城市社会结构的讨论，其中一些作品虽然涉及了城市社会人群和职业群体，却并没有把性别问题作为关注点，也没有对城市中女性职业群体的发展进行深入考察。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女性研究学者开始尝试用多元化、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女性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的处境，重视“差异性”。在他（她）们看来，女人的生活经验是被各式各样的社会势力所建构和协调的，女人们并不是分享着同一种压迫经验，她们遭受压迫的经历和原因也并不单一。以往女性研究中根据少数妇女的经验所作出的普遍性、概括性论断并不可靠。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的女性研究

① 北京久为帝都，其城市发展既受惠于这种政治身份，又受制于这种政治身份。北京在近代的政权更替频繁，几乎体现了整个中国的时局变迁；另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内陆城市，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城市的社会特征。在时代大变局下，北京的城市发展既有自身特色，也具有较多的普遍特征。

② Myer Jeffery F, *Dragons of Tian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Munro, Robin 1990.

③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④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⑤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⑥ 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的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也不再简单将女人刻画成受害者和受压迫者，而是开始注重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重视女性在复杂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玛杰里·伍尔芙（Margery Wolf）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①（1972），曼素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录：中国漫长的十八世纪中的妇女》^②（1997），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③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在国内的女性研究中，杨念群关于女子缠足的研究^④从后现代视角出发，试图超越女性研究中男权/女权对立的视角，凸显男女性别差异的复杂社会历史背景。李银河在女性研究中也主张“超越性别”^⑤的观点，反对传统研究中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试图在一种多维的、多元的背景下去分析具体的性别群体。李小江^⑥则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不同的特点，强调女性问题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

对于城市中女性群体的研究，近年来也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

韩起澜（Emily Honig）在《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史 1919—1949》^⑦（1986）中分析了上海纱厂女工这一独特社会群体在当时城市中的生存状况。作者通过广泛的访问和翔实的史料积累，全面而清晰地展现了当年的纱厂女工的人员构成，入厂渠道、厂内人际关系以及地域观念和帮派斗争对女工的影响。韩起澜认为，纱厂女工因为籍贯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分成了很多派别，女工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陌生人”而非“阶级姐妹”。工人运动并不完全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而是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内涵。

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在《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⑧（2003）中，指出妓女是上海城市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她们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和

①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Press, 1997.

③ [美]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

④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载《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4期。

⑤ 李银河：《性别特征与本质主义》，载金一虹、刘伯红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⑥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编：《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

⑦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anford: S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⑧ [美]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婴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社会变化有最敏感的反应。近代上海的卖淫状况，也可以看做近代上海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晴雨表。作者分析了上海妓女群体的自身特点，也关注了当时的政府和公众对妓女的态度。对妓女的研究正是为了展现近代城市社会的发展状况。

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①（2003）是以后现代视角解读 20 世纪上海娼妓业的力作。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娼妓业的发展与上海的城市现代性的关系。妓女曾经是上海最具风情的女人团体，是男性审美消费的目标，但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却一步一步将她们变成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的管制对象。娼妓始终处于社会精英的话语表述之中，她们是精英人士欣赏、管制、规范、治疗乃至取缔的对象。妓女的身体成为了现代城市中各种权力群体进行自我展示的场所。作者试图通过妓女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微妙互动来进行一次“声音考古”，通过各种历史记录来逼近妓女的原声，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考古”过程中厘清妓女的形象在权力网络中是如何被各种权势所塑造和转换的。

这些针对近代城市女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贺萧和安克强的关注点是妓女这样的城市边缘群体，韩起澜则是对女工群体和工人政治的研究，而本书的研究希望扩大视野角度，考察城市中多种不同职业的女性群体，通过不同女性职业的发生发展，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生活状态。此外，了解城市社会中不同领域的女性职业的发展，也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近代城市社会的现代转型之路。

本书尝试从社会史的研究角度分析近代女性职业的发展，将女性职业和城市社会的发展都放入现代性的研究框架中。选择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切入，探究近代城市的现代转型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关系的特点。希望在这一意义上将性别研究和城市研究结合起来。

现代性的问题是本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的”。在近代社会文化的大变迁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因素交织作用，形成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女性在近代的社会角色是和现代性进程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女性走向社会空间，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所以在对现代性的研

① [美] 贺萧：《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究中，我们必须正视其中蕴涵的女性色彩。

女性研究不仅仅是对女性自身的研究，而是将女性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网络结构中去加以分析，考察女性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些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不平等的社会机制。这些机制造成了男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而这种差异的社会性别观念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影响甚至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从而使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变得合理化。女性研究正是要对这些“合理化”现象和制度提出质疑和挑战。

本书关注的主题是女性职业。就女性职业研究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当代社会，集中于二战结束后女性职业逐渐普遍化的历史时期。这类研究是从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着手，探讨女性职业对于当代社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近代历史研究中，对女性职业的关注往往淹没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话语中。近代女性职业的发展常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内容，作为倡导实业，实现女性经济独立的表征。对于工厂女工等特殊职业领域，研究的材料和成果是较丰富的，但对女工的研究还是主要将其作为近代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或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后果。对于女性职业在近代的兴起阶段，已经有何黎萍^①等人作出了一些总论性的研究，但还缺乏深入阐释。

本书所论及的女性职业主要是近代社会中一些新兴的女性职业。这些女性职业的出现和城市社会的近代转型有着密切联系。针对城市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发展领域，笔者选择了一些相关职业加以考察。例如在政治领域，选择了机关女职员和城市女警察；在教育文化领域，选择了女教师；在商业领域，选择了女招待、舞女；在工业发展方面，则选择了女工。

每一种女性职业发生发展都和具体的时代背景、城市环境密切相关。本书所考察的几类女性职业，也对应着城市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教育文化的发展以及都市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城市工业的进步，而这些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城市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了解不同的女性职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城市中不同领域的社会变化，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勾勒出近代城市的面貌。

单就女性职业的发展来看，不同类别的女性职业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其发展程度和规模各具特色。女工、女教师等职业出现时间早，发展规模大，得

① 何黎萍：《中国近代妇女职业的起源》（《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抗战以前国统区妇女职业状况研究》（《妇女研究》2002年第6期），《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职业状况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到了较多的社会认可。舞女、女招待等职业发展较晚，还一直被指有色情意味，其发展之路充满重重阻挠和波折。女警察、政府机关女职员等职业则主要是政治风潮的产物，被很多人视为花瓶式的点缀。

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各类女性职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职业在发展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些城市间的差异性，不同职业间的差异性也正是本书要努力去呈现的东西。

为了展现各类女性职业的发展概况，以及近代城市的发展特点，本书在对每种具体女性职业的分析中，穿插引用了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材料，并希望通过一定的比照，突出女性职业的发展特色。同时，针对一些女性职业的发展，也集中采用了以北京为主体的历史材料。以期更好地体现女性职业发展和近代城市转型之间密切和复杂的关系。女性职业在某一所城市的发展可能是具体的，但其中涉及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中却又是共同的。

概言之，本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几种主要女性职业的发展，希望由此展现近代城市复杂生动的社会状况。对女性职业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民国时期新兴女性职业群体的深入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女性职业的发展历程去把握近代城市社会的脉动。

第一章 性别与权力：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

法国城市地理学家潘什梅尔说：“城市现象是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①

从语言学意义上看，“城市”一词是由“城”和“市”两个字构成的，这也意味着，城市的出现需要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城者，所以自守也。”^②古代的“城”是指一种以防御为目的的建筑体系。而“市”则是人们交易往来的场所。《周易·系辞》中说：“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城市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相对于乡村、田野的一种社会空间，城市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大量的人群，由此也体现了最为集中的社会关系。

一、他者的世界：公共空间的男性化

在城市社会这样一种固定的建筑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容纳着各式各样的社会人群。不同的人群出于交流的需要，在家庭之外的城市空间中形成了一些共享的、固定化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些空间主要是一些贸易和休闲场所。在中国的古代城市，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是市场、庙宇、茶馆以及其他一些休闲场所。但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公共空间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它们基本是男性的天下，女人是被排斥在外的。长久以来，城市社会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或者暴力禁止，不允许女人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间，但女人一直是很难涉足其中的。所有城市公共设

① [法] 潘什梅尔：《法国：环境农村、工业和城市》（下册），叶闻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② 《墨子·七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施也是以男性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

本来，女人和男人共同生活于城市社会中，同为城市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男女两性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赋予女人更多照顾家庭、抚育子女的责任，在习俗观念上要求女人应有适当的行为举止。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弱，容易遭受男性的恶意侵害。女人也一直是社会经济体系里的弱势者，她们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导致女性无法与男性有相同的机会使用城市公共空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习俗对女性的限制是很严格的，并细致地规定了女性公开活动的尺度。

《礼记·内则》规定：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筐。其无筐，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①

宋代以后，男女之别更加严格了。司马光的《涑水家仪》规定：

“凡为官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外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言，传致内外之物。”^②

这些原则虽然不是在每一朝代、每一地区都被严格地遵循，但是，毫无疑问，女子相对于男子而言一直是社会中被规范和压抑的对象。“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礼俗虽然是对男女提出了同样的行为要求，但实际上，真正被约束的只是女人。“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的观念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规训了女子的言行，使女子自觉的禁足于闺阁之中，形成与男子疏远、隔绝的心理。

^① 《礼记·内则》。

^② （宋）司马光：《涑水家仪》，浙江：李际期，清顺治间印。

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女人都被禁锢于闺阁之中，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非常狭小，而男人可以在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中活动，在社交活动中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中很少有女性的身影，庙会、戏院、茶馆等公共活动场域，都是不允许女人涉足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公共空间主要是男性公开活动的领域，是一种男性化的他者世界。

二、性别与权力：家庭中的男女地位

家庭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在女人很难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传统社会，家庭无疑是性别权力展示的重要场所。在家庭中，每个成员所占据或拥有的空间是有差别的，比如，厨房这样的特定空间一般是家庭中女性经常活动的领域，而在厅堂之中，则是男性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家长所主宰的空间。

“男主外，女主内”是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描述，但是，在家庭的空间中，女人真的能够居于主导地位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三从四德”一直是规范女性行为的训条。“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这样的观念使得女人的家庭地位永远是隶属于男人。男性家长制一直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核心。这使得女人即使在家庭这样“内部”的社会空间中，也依然要受到男性权威的控制。如果说一些待嫁的少女还有“闺房”这样较为私密的空间，那么嫁后的女人连这样一点独立空间也丧失了。

女性主义学者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①在《自己的房间》中提到：“女性在出嫁前附属于父家，嫁出后，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女性一生几乎是一个为别人迁移的历程；在夫家或父家属于自己的空间是厨房等制造再生产的地方，或者夫妻寝室中那一个小小的梳妆台……。”伍尔芙指出：“如果女性要为自己而生存，首先就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但是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自己的空间”又谈何容易！

在近年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在传统家庭中，母亲的地位是很特别的，母亲虽然是女性，但在家庭中却有较为尊崇的地位。如玛杰里·伍尔芙（Margery Wolf, 1972）^②在对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的研究中提出了“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概念，认为生育子女使得普通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生下儿子的女人，更可以“母以子贵”，在父权制家庭中获得母亲

① [美] 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张秀亚译，台北市：天培文化，2000年。

②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